

##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较之文学与史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建设具有令人羡慕的特点。首先是起步较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冯友兰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成为“建国以来文史哲类史料学的开山之作”（傅璇琮《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总序》语）。其次是大家荟萃。继冯著后，不计二〇〇二年收入《朱谦之文集》第四卷的朱氏《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遗稿，八十年代有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九十年代有萧萐父的《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相继问世。刘文英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则是新世纪第一本反映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新貌的著作。刘先生研治中国哲学逾四十年，所著《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王符评传》及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都是哲学史界可观的收获。本书是他

以多次给研究生讲授同名课程的讲义为基础，邀约南开同仁扩充而成的，并经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本书封面、封底、书名页、内容提要与主编后记都反复昭示了这一点），在二〇〇二年六月至二〇〇三年四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两度印行。

跟过去的同类著作相比，本书有一些显著的特色：一是编著者不满于冯著“对历代哲学史料的介绍和考证，具体涉及到很多方法，但没有从中提取出来，没有系统化，缺少操作性”；也不满于张著“对方法问题重视不够”，因而有意识地“突出了史料学的方法，希望真正有助于人们寻找史料、鉴别史料、解释史料和整理、运用史料”。二是由于成书最晚，有条件反映新发现的材料和新获得的成果，前者如郭店楚简；后者如《淮南子》注本，在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之外，又著录了一九九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和一九九八年中华书局的何宁《淮南子集释》。三是专辟一章，介绍了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料。

但在上述优长外，本书也有数不在少的明显的

不足。

## 一、荐书失当

哲学史史料学的主要任务是推荐介绍哲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著作。就著作版本而言，一般总要取其精善，兼顾易得，并能体现新的研究水平。本书无论是对原著读本，还是在相关研究著作的选择上，都还有可改进之处。

先说原著读本的推介。刘宝楠《论语正义》与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举《诸子集成》本，吴毓江《墨子校注》举一九四四年重庆排印本，焦循《孟子正义》举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印本，王先谦《庄子集解》举中华书局一九五四年印本，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举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印本，王琯《公孙龙子悬解》举中华书局一九二八年印本，按以上这些著作自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由中华书局约请专家重新校点，改正了各旧本多处错漏，收入《十三经清人注疏》和《新编诸子集成》。另外失举的，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不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孙猛《校证》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不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徐小蛮等校点本；郑樵《通志·校讎略》不及中华书局的王树民《通志二十略》校点本；谭峭《化书》不及中华书局收入《道教典籍选刊》的校点本；罗钦顺《困知记》不及中华书局收入《理学丛书》的校点本；方以智《通雅》到了不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由侯外庐主编的《方以智全书》第一种在校点本；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不及中华书局多次印行、附录了后人系列补正著作的《古书疑义举例五种》校点本——而上述著作已举出的并非都是善本，有的是《四库全书》本乃至《万有文库》文。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举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作者后来自我检讨说这一版“以各种原因，错字衍文以及脱夺倒转之文字语句，几乎数不胜数”（《修订小记》），应该推荐一九九〇年出版的修订本。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举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该书一九八三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增订本，一九九二年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又收入了作者标明了的“定本”。《刘禹锡集》举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排印本，该本以《结一庐

朱氏剩餘叢書》中的《重刊明鈔劉賓客文集》為底本，稱個別文字參照其他幾種版本作了校改，卻無校記；而一九九〇年中華書局收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的校點本以宋紹興八年刻《劉賓客文集》為底本，列舉主要校本五種、參校本二十種，詳列校記，並附詩文補遺，明顯勝於前本。《陳亮集》舉中華書局一九七八年版鄧廣銘校點本，而一九八七年出版了校點者據新見宋本《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作了補益勘正的增訂本。泂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舉文學古籍刊行社本，更值得推薦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影印收錄了水澤利忠《校補》的《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楊樹達《論語疏證》與《鹽鐵論要釋》皆舉科學出版社五十年代印本，二書八十年代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印的《楊樹達文集》，由楊門高弟廖海廷、郭晉稀分任校勘，較舊本有進一步加工。此外一些新的典籍注本未能及時反映，如《阮籍集》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校點本，不及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出版的陳伯君《阮籍集校注》；《成唯識論》舉各舊本，不及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出版的韓廷杰《成唯識論校釋》。

再说研究著作的推介。训诂工具书举要涉及甲骨文，举荐的是一九六五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的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而一九九六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于省吾主编的在《集释》基础上又汇集了其后三十年研究成果的《甲骨文字诂林》——虽然并不完备，但起码也该与李书并举。在哲学家传记与年谱史料中提到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举荐的是一九三五年的商务印书馆初版，而一九五六年香港大学出版了作者对原书缺失作了约二百五十条订补的增定本，一九八五年经中华书局影印，二〇〇〇年复经商务印书馆影印，已在大陆广为流布。关于哲学家的生平资料，有时举荐到了《中国历史小丛书》之类的普及读物，但对一些相对重要的著作反而付之阙如。例如朱熹部分，除却历代专书，还列入了今人《朱熹的师承》、《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诸文，却不及束景南八十万言、被张岱年誉为“考证之精，辨析之细，都达到了新的水平”的《朱子大传》（至于二〇〇一年付梓的束著《朱熹年谱长编》则与本书出版时间相近，自然是不能苛求于编著者的了）。王阳明部分，列举从钱德洪《阳明先生

年谱》到今人《王阳明哲学研究》等著作十余种，却不及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而陈著《附考》章的《年谱笺证》、《续编书札考》、《越城活动考》、《著述辨疑》都包含了对旧编王氏年谱的补正，即使不说比所列入的某些著作更有价值，至少也该一提。

还有非常成问题的，是在王安石部分列邓广铭《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举荐了一九七五年版。这一版里不无迎合形势的内容，作者自责是“跟着当时的歪风邪气走”而“搞出来的精神污染”。四年后出版修订本，摒弃了因受“评法批儒”运动影响而遗留的若干时代印迹，添写了《附说与“三不足”有关的两个问题》一节和《断西夏右臂的河湟之役》一章。邓氏晚年又对该书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不仅继续清除“其中所掺入的有关‘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污染因素”，还因为自己“加深了对王安石发动于十一世纪的变法改革事业的理解和认识”（《序言》），从而对相关问题作了新释，书名也改为《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九九七年由人民出版社印行，《内容提要》称“作

者在耄耋之年，字斟句酌，剔除了‘文化大革命’所强加给原书的‘左’倾观点，增补了大量对史事的考订和辨伪，基本上廓清了王安石研究中的重重迷雾”。二〇〇〇年该书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收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代表了作者的最终定见，全然不是当年的旧版所能比拟的。

## 二、表述欠妥

在《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注疏与解释》中述及以形索义的训诂方法，举反面例子说：

甲骨文和金文“王”字本作斧钺之形，表示王权，也是象形。董仲舒根据后世楷书之形曰：“古文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这完全是附会和杜撰。

按楷书形成的时间，文字学家有不同的意见，但公认不早于东汉，西汉的董仲舒是没有眼福看到“后世楷书”的——楷书不仅较之甲骨金文，对他也同样是“后世”之物。其实“王”字在篆书和隶书中



已非斧钺之形，董氏应该是根据篆书或隶书来作出推断的。

述及古籍校勘，称郑樵《通志·校讎略》为“我国第一部校勘学专著”。按郑樵承用《别录》校讎之名而作《校讎略》，其范围已不限于校勘而扩大为文献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图书类别与目录编次。后世学者因此而将“校讎”分为广狭二义，广者指文献学，狭者才指校勘。郑樵用的正是广义——这只要不是望文生义，而翻翻郑书目录《秦不绝儒学论》、《编次必谨类例论》等就可一目了然。胡道静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撰写的“校讎学”条指出：“郑樵所关心和讨论的主要是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等，而对‘鱼鲁、豕亥’等校勘问题则略而不论。”管锡华也专门澄清过：

南宋郑樵撰有《校讎略》，后世有人以为校勘学当始于此，这是误会。郑书是校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论述的是目录学方面的问题，少及校勘。《校讎略》所论的二十一个问题，其中与校勘有直接关系的只有第十一个问题《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中的“校书久

任”一个方面而已。（《校勘学》四九页，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因校勘而述及避讳，谓避讳是“因怕触犯皇帝忌讳，凡皇帝之名所用之字均以他字代之”。这自然是避讳的主要表现，却并不是避讳概念的完整揭示。皇帝亦即所谓“国讳”之外，父祖、上司、一切尊长与敬重者之名，原也都在避讳之列。陈垣《史讳举例》卷二《避讳之种类》列举的《文人避家讳例》、《宋金避孔子讳例》等，都跟皇帝之名无关。

评介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江藩语：“六朝经学之说，散佚略尽，惟《经典释文》岿然独存，前此止作音，惟陆氏兼释经义；前此止音经，惟陆氏兼音注。体例独别于诸家，而能集诸家之成，故为不刊之典。”标出处为《经解入门》。按《经解入门》乃后人伪托江藩之名以行，冯德材为是书所作的跋文即指出了这一点，其后为江藩编年谱的闵尔昌以及近世学者伦明、顾颉刚、周予同皆曾言及，今人亦有详证，可参看《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第一辑所刊谷建《〈经解入门〉辨伪》及《中国语文》

一九九九年第五期所刊司马朝军与李若晖《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系袭江藩〈经解入门〉而成吗？》。

介绍郭庆藩《庄子集释》，仅言“集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音义》”；容易使读者误会郭著只汇录了三家书，而事实上《集释》还包罗了卢文弨、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等清代学者的成果。所列三家书诚然是《集释》的主体，但若止此而已，其书就不可能在《庄子》研究史上享有现在的地位——三家书既传于世，汇录并不困难（何况成疏原即依附郭注，是合郭注为一体的）。倒是郭氏对清人相关资料的辑存，不但为后人提供了考校的方便，还成为某些失传著作唯一的来源——如其伯父郭嵩焘的《庄子评注》已佚，今天只有通过《集释》，我们还能看到这位晚清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庄子》的见解。即此也可知《集释》的价值原不以三家书为局限，这是不能不交代明白的。对照一下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中的《集释》提要：

以成玄英疏为蓝本，附陆氏《释文》，采近代各家及郭嵩焘说，并加按语。全书解说甚为详尽，辄

有发明，颇便研究。（第二册二二八页，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

这样的表述就比较周到了。

还有一些枝节问题。一是类别不相符。如把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及李学勤的《周易经传溯源》、陈梦家的《尚书通论》、罗根泽的《管子探源》及胡家聪的《管子新探》、詹剑峰的《墨子的哲学与科学》及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等显非注本的研究著作分别列在《周易》、《尚书》、《管子》和《墨子》的“主要注本”之下。二是名实不相应。如列述隋唐以后的哲学家著作，一般都称“著作版本”，但在李觏、王安石、二程、朱熹名下则称“李觏和王安石的著作主要注本”、“《二程全书》的主要注本”、“《朱子文集》和《朱子语类》的主要注本”，而其实所列者并无任何“注本”。三是表述不明确。如《孟子字义疏证》所列版本是“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选注本”——多半会让读者误以为这是个《孟子字义疏证》的选注本，其实所指的乃是收录了《孟子字义疏证》全文以及《原善》等的《戴震哲学著作

选注》，但在书中却无任何说明。有些表述也应改进，如说《五灯会元》“《四库全书》已著录了《提要》”，这样语无伦次的句子也不宜出现在一部教科书里。

### 三、著录不确

史科学著作涉及的人名与书名众多，很容易出错；但就其指导学生查考相关史料、培养学生树立踏实学风的基本功用而言，又最不应该出错。这就需要编著者谨慎下笔，仔细校核。可惜本书无论人名、书名还是在出版单位、出版形式等方面都有著录错误。关于出版信息的错误略少一些，如把《金岳霖学术论文选》归属甘肃人民出版社（应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显然是把选集跟多卷本《金岳霖文集》的出版者搞混了），把周祖谟的《广韵校本》归属上海古籍出版社（应为中华书局，这可能是把周校跟由周氏作序的《钜宋广韵》的出版者搞混了），把商务印书馆说成上海印书馆，把有的古籍影印本说成排印本。而关于人名和书名的错误就比较多了。

人名如：把东汉经学家包咸误为仓咸，把西晋

经学家庾峻误为廋峻，把著《管子注译》的赵守正误为赵宁正，把著《商君书锥指》的蒋礼鸿误为蒋鸿礼，把著《淮南子校释》的张双棣误为张双隶，把著《郭象庄子注校记》的王叔岷误为王叔民，把著《三经新义辑考汇评》的程元敏误为程玉敏，把著《章太炎年谱》的高景成误为高京成，把著《梁启超年谱长编》的赵丰田误为赵本田，把著《中国哲学史》的劳思光误为罗思光，把著《人生哲学》的李石岑误为李十岑。至于把著《龚自珍年谱》的郭延礼误为邹延和，则百分之百是抄袭的结果——大概是据手书排印的缘故，萧蓬父的《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把郭延礼错成了邹延和，本书显系照录而未核实。误字之外，还有漏字。有的字漏得光明磊落——如在邢昺的邢字下出现了一个空格，至少还给读者的怀疑留了余地。但有的字漏得干净利落——把双名变成了单名，却不留一点痕迹，容易让不熟悉的读者以为那就是全名，如把为朱熹作年谱的清代学者王懋竑错成了王懋，把为黄宗羲作年谱的黄氏七世孙黄炳堃错成了黄炳，后面也未出现空格，就难免给读者以误导了。

书名如：把《四部备要》误为《四库备要》，把《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误为《老庄韩非列传》，把《盐铁论》误为《盐钱论》，把李鼎祚的《周易集解》误为《周易解释》，把朱熹的《周易本义》误为《周易正义》，把李贽的《四书评》误为《四书评论》，把李塨的《讼过则例》与《瘳忘编》分别误为《论过则例》与《忘编》，把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分别误为《孟子字义疏》与《孟子字义疏正》，把后人所辑俞樾的《诸子平议补录》误为《诸子评议录》，把孙诒让的《墨子年表》误为《墨子年代》，把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误为《经学通史》，把章太炎的《体撰录》与《管子馀义》分别误为《文体选录》与《管子馀议》，把吕思勉的《先秦学术概论》误为《先秦诸子概论》，把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误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误为《墨经的逻辑》，把谢国桢的《明末清初的学风》误为《明清之际的学风》，把杨向奎的《清儒学案新编》误为《清代学案新编》，把王茂等的《清代哲学》误为《清代哲学史》，把刘起釞的《古史续辨》误为《古史续编》（身为顾颉刚的传人，

作者是因书中所收皆《古史辨》后“继续考辨古史及有关之文字”，才起这个表明其学术趋向的书名的)。

《〈周易〉经学的哲学史料》称“《汉书·艺文志》在《经籍略》著录《易经》十二篇”。不知编著者用的是什么秘本《汉书》，在《艺文志》中居然有“经籍略”？（至于《六艺略》中的“易经十二篇”，当读《易》为句，冒起下文，其下分记“经十二篇”，传若干篇，同篇中的“《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诗》，经二十八卷，齐、鲁、韩三家”等其例皆同，可参看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此姑不赘。）

《韩愈的生平史料》称历代所撰韩愈年谱甚多，而“今人徐敏霞有新撰《韩愈年谱》（中华书局一九九一年）”。按该书是自宋至清七种韩愈年谱的辑辑，徐氏是辑校者而不是“新撰”者。又其下《韩愈的著作及哲学史料》云：

韩愈的著作均收入《韩昌黎集》……近人马通伯有《韩昌黎文集校注》（一九五七年古典文学出版社



出版)，但存文去诗，一般为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

新的校注本有童第德《韩集校注》，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马其昶、张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我们不敢肯定编著者究竟是否知道马其昶就是马通伯（其昶其名，通伯其字），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马其昶是该书的作者，而不是“整理”者；第二，整理者是马氏之孙、已故古典文学研究名家马茂元，而不是“张茂元”。（至于童著只是韩集校注札记，不是全书的校注本，此亦不赘。）

《戴震的著作与哲学史料》，据《清史稿·艺文志》及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列述戴著近四十种，包括或根本没有完成、或早就不知下落的《转语》、《尔雅文字考》、《大学补注》、《仪礼考证》、《七经小记》等，下称：“戴震的这些著作除了《学礼》十三篇》、《六书论》三卷和《历考》、《古历考》佚失之外，其余皆流传至今。”（段氏《年谱》明确记载《转语》“惜此书未成”，《七经小记》“未成”。）